

中國文學欣賞舉隅

如何欣賞中國文學呢？

本書作者擷取東西方文學批評的精華，

也就是運用中國傳統的文評詩話材料，

加上西方科學的綜合和分析，

提供初學者學習欣賞中國文學入門的利器。

傅庚生◎著

china

中國文學欣賞舉隅

傅庚生◎著

中國文學欣賞舉隅

著者：傅庚生
發行人：楊愛民
出版者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
電話(02)23216565 · 23952992
FAX(02)23944113
劃撥帳號 15624015
出版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網址：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>
E-mail：wanjuan@tpts5.seed.net.tw
經銷代理：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 4F
電話(02)27953656(代表號) 傳真(02)27954100
E-mail：red0511@ms51.hinet.net
承印廠商：晟齊實業有限公司
定價：200 元
出版日期：民國 91 年 12 月初版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57 - 739 - 422-1

序

傅庚生先生的《中國文學欣賞舉隅》一書，在近年出版的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中，是最值得我們細讀的一部。他在〈書旨與序目〉中說：

自有清一代迄於今，世尚樸學。探討文學者，亦幾乎以考據為本。若就文以論文，輒必震駭群目，甚至騰笑眾口。本末之所在，久其矇然；買櫝而還珠者，宜不少矣。

這見解是很正確的。因此，我聯想到梁宗岱先生在《屈原》自序中所說的文學批評的內線和外線。梁先生所謂外線，便是傅先生所謂樸學的考據；所謂內線，便是傅先生所謂就文以論文。我願就這一點上略申己見。

中國之有近代式的文學批評，始於王國維先生。王先生以天縱之姿，不但在詩歌的創作上弱冠便有偉大的成就，尤其在古文學的研究上留下了不朽的傑作，如《宋元戲曲史》、《人間詞話》、《紅樓夢評論》等。他所以能有超人的成績，一方面因為他對於西洋文學和哲

學有湛深的研究，一方面也因為他深懂得分析的 (analytique) 和綜合的 (synthétique) 方法之運用。例如在他寫《宋元戲曲史》以前，他已寫了《曲錄》、《戲曲考源》、《唐宋大曲考》、《優語錄》、《古劇腳色考》、《曲調源流表》等六種。這六種便是近於所謂外線的著作，《宋元戲曲史》便是近於所謂內線的著作。正確的說，前六種是分析的工作，後一種是綜合的工作。分析 (analyse) 為綜合的準備，綜合 (synthèse) 為分析的目的。不僅文學批評必須兼備兩種工作，任何科學的研究莫不皆然，任何成功的學者決不會忽視其中的一面。

五四運動時代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，並且認為清代樸學方法含有科學精神，故二十年來文史研究都注重於史料的考訂，漸漸成為風氣。後來變本加厲，竟認史學即史料學，那當然是錯誤的偏見。錢穆先生在《國史大綱》裡分現代史學為三派：一是傳統派或記誦派，二是科學派或考訂派，三是革新派或宣傳派。他說：

傳統派主於記誦，熟諳典章制度，多識前言往行。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。二派之治史，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，同於缺乏系統，無意義，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，與當身現實無預。……惟革新一派，其治史為有意義，能具系統，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，能求把握全史，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力已往文化

成績之評價。然急於求智識，而怠於問材料。因此，其於史，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，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。彼於史實，往往一無所知。彼之所謂系統，不啻為空中之樓閣。彼治史之意識，轉成無意義。彼之把握全史，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。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之評價，非有外在之根據。其縮合歷史於現實也，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。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者。

他理想中的史學是「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，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；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，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，呈露其平易之面相」。這話雖略有語病，然大體是正確的。

文學批評也是如此。錢先生所謂第三派近於梁先生所謂內線，第二派近於外線，加傳統派而為三。除傳統派不足道外，我們理想中的文學批評便是用外線的工夫而達內線的目的。其實錢、梁二先生所用名詞都嫌不妥，正確的說，就是用分析的工夫而達綜合的目的。郭沫若先生在《屈原研究》裡說：

講屈原的詩，首先須要考證屈原的詩。現在世間流行的屈原的作品，有好多成了問題。我們要把這些成問題加以考證，然後纔能更進一步作藝術的研究。

又說：

我們研究屈原的作品，過細的說，每一篇都應該加以討論，這是首先的工作，即基礎工作。這步工作沒有做好，更進的研究便成為空中樓閣。

這幾句說明文學批評的步驟最清楚而正確。梁先生把外線內線當作絕不相容的兩條路，其實只是一條路的前後兩段。試以建築為喻：外線工作便好比測量地基，鋪平沙石；內線工作便好比築牆蓋瓦，開窗立門。如無穩固的地基，雖七寶樓臺勢必圯於一旦；但只做好地基便認為已盡建築之能事，自然是大錯。人非全材，各有所長，也各有所短；合作則兩蒙其益，相輕則各有所損。

了解了這一點，便找到了文學批評的正確的路線了。未先做考訂的工夫而遽作批評者，終難免「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」之譏。例如梁先生說屈原原始而學習，作〈九歌〉；繼而懷疑，作〈天問〉；繼而自我認識，作〈九章〉；繼而產生傑作〈離騷〉，同時附帶來兩個短篇〈卜居〉和〈漁父〉；後來不甘心早死而作〈招魂〉，最後又發出〈遠遊〉的呼喚；不借重半句史料，不依傍半件史蹟，而排列得如此完整，豈不正是郭先生所譏的「空中樓閣」，

錢先生所譏的「臆測之全史」？未先作分析的研究，而遽寫綜合的論著，結果未有不慘敗的。反之，認分析的工作為最終的目的，如傅先生所譏的「買櫝而還珠」，當然是同樣的錯誤。

以上略略說明文學批評上分析和綜合的兩種工作應該並重。不過比較起來，綜合的工作是更重要，也更困難。傅先生這部書正可指導我們如何從事於這種艱鉅的綜合工作，傅先生的見解和工力也最適宜於指導我們。我曾見他的手稿，對於過去文評詩話的材料，分類搜集，用力至勤。搜集後，他又運用西洋文學批評的理論，加以部勒和整理，積數年之久，方成此鉅著。這正是錢先生所謂「於極艱苦之準備下，呈露其平易之面相」，不但可作初治文學者入門之資，亦可供專家參考之需。這無疑的將是文學研究者必備的書籍。

陸侃如序於東北大學

自傳

傅庚生

我是漢族人，字肖岩，曾用筆名有，傅肖岩，肖岩，肖巖，筱岩，更生，齊爭等。我家祖籍山東省蓬萊縣。五世祖時因逃荒到東北，在遼寧省瀋陽縣城南中路煙台村落戶務農。到我祖父傅宗山（峻峰）時，方開始讀書，他未能登科，只好改學中醫，終生在鄉間開業，父親傅良弼（陟岩）自幼讀書。一九〇〇年，廿歲時考取秀才後，即在遼陽縣教書，清光緒末年考取優貢。時值康梁變法，清政府在全國選擇，「心術端正、文理明通之士」，用官費派到外國留學。我父親即被選派赴日本留學。歸國後多年從事教育工作，是一個教了二十幾年書，自詡為「桃李滿天下」的老儒。一九三二年冬在瀋陽病逝，年五十二歲。

自傳
一九一〇年（清宣統二年庚戌）十月二十七日我生於遼陽。六歲時入吉林省立模範小學讀書，一九二二年畢業，一九二三年春考入瀋陽第三中學，在中學學習期間，我的語文老師楊夢熊先生對我的教益非淺，他引導我掌握了古詩詞的格律及作法，為我以後的從事詩詞的研究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。一九二六年我轉入東北大學國文系預科，在預科讀書時即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，當時東北風氣初開，我醉心於新文藝和翻譯文學，曾和楊予秀，吳恩裕，

趙石溪等同學自編、自寫、自印文藝刊物《夜航》，共出四期，後因籌不出印刷費而停刊。以後，我就常在報刊上投稿，想作個業餘作家了。一九二七年冬，我與楊予秀、吳恩裕等同學一併升入了東北大學本科哲學系，一九二九年因該校要取消哲學系，加之當時和我接近的同學楊予秀、吳恩裕等都次第被學校開除，我很不自安，想另謀出路。經同學介紹，翌年春，被派任東省特別區（哈爾濱）教育會編輯，並轉學法政大學經濟系。數月後，調任東省特別區（哈爾濱）教育廳第二科科員，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春我先後在《盛京日報》、《泰東日報》、《新亞日報》、《益世報》、《大公報》等報上發表了一些小說和雜文。其中曾在《泰東日報》上發表過長篇連載小說《燕侶鶯儔》等。

我到教育廳後不久，因工作上的勞累與困難，且在法政大學讀書又是有名無實，因此漸萌悔念；遂於一九三一年夏復學東北大學國文系。

「九·一八」事變後，我們全家逃到北京，當時東北大學的學生一部分在北京復學，一部分由教育部安插，分別在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寄讀，我就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做了寄讀生。翌年暑假，參加轉學考試，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。一九三二我父因患心臟病，突然去世。我父死後，家無恆產，我的胞兄傅誼生在北寧鐵路局車站當一名小職員，月薪只有四十元，不可能供我讀書，因此，我只好謀求一個職業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學習。一九三二年我兼任了北京弘達學院語文教員。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一般東北青年都有民族意識，都想抗日救

國。當時梅公任、周天放等東北人在北京發起建立東北行健學會。一九三三年我加入了東北行健學會，並兼任民友書局編輯。一九三四年，我於北京大學畢業，作了弘達學院的專任教員。在北京大學讀書時，我曾寫過一篇小說〈桐兒〉（又名〈雪兒〉），曾在《東北月刊》上發表過），馮文炳（廢名）先生看過後，說我寫得好，但他又說，要想在創作上搞出成就來，非搞好外文不可。馮先生的這些話對我影響頗大。當時，因為我的外文水準不高，所以從那時起，我就逐漸地開始從文學創作轉向了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，開始了社會科學研究生涯。北大畢業後，我的同學華鍾彥曾對我說：許之衡先生說過，要想搞出成績來，一定要學會作學問。金靜庵先生後來也說過：要搞就要搞真學問，決不要搞假學問。這些話對我都有一定的啟發。從「九一八」事變至一九三四年這期間，我常在由民友書局出版的行健學會的會刊《行健月刊》、《行健叢書》、《行健旬刊》和在上海的東北協會的會刊《黑白半月刊》、《東北月刊》等雜誌上發表一些關於東北問題的記載、掌故和小說、詩歌等。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向日本帝國主義屈服，命令華北當局取締一切抗日活動。行健學會遂併入了在上海的東北協會，民友書局從此停辦。一九三七年我兼任教育部成立的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第二組組長。蘆溝橋事變後，我到了武昌擔任湖北省教育廳秘書。同年六、七月間，武漢告急，便到四川萬縣賦閒。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任東北協會第一組幹事、主任幹事、秘書。當時協會內備有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由於工作上的方便，我閱讀了其中大部份的中國古

典文學書籍，為日後進行古典文學研究作了一個初步的奠基工作。自到萬縣後，我就加緊備課，準備教學，並開始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，曾在當時的《國文月刊》、《東方雜誌》上發表了一些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。在那一段時期裡，我一直是對中國古典文學作些廣泛的研究，後來方專心致力於唐代文學的研究。

一九四一年九月，我擔任了東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並兼校長辦公室秘書。到東大以後，認識了高亨、陸侃如、馮沅君等先生，又因經常在雜誌上投稿，與葉聖陶、朱自清、朱光潛、陳中凡、余冠英、林庚、李廣田等先生時常通信。一九三九年，我即想寫《中國文學欣賞舉隅》。原本想用語體文寫，後因所引材料均為文言，用語體文寫總感到有些格格不入，於是還是決定用文言寫了。稿子寫成後，曾給朱自清先生看過，他說，寫法很好。一九四三年經余冠英先生介紹，由開明書店出版了該書。《中國文學欣賞舉隅》共二十六章，每章之中採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為欣賞的資料，從文學的感情、想像、思想、形式等諸方面進行了賞析。陸侃如先生為本書寫了序言。一九四三年冬我離開東北大學，經郭效汾先生介紹，到四川金堂銘賢學院任教。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，葉聖陶先生介紹我到成都華西大學任副教授，並在成都市一中、市女中及甫澄中學等校兼課。這時才與葉聖陶、朱自清、陳中凡等先生晤面，時相過從，立定志向搞一輩子社會科學研究。同年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《中國文學批評通論》。《通論》共分三編十一章，上編四章為緒論，中編四章為本論，下編

三章為結論。當時其它的批評史都是作縱的、史的敘述，《通論》則是採用橫的寫法，平列起思想、感情、想像、形式四大項目。

一九四六年十月間，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朱光潛介紹我為北大中文系講師。其時物價飛漲，我雖在各雜誌上投稿，並有朋友資助，但生活仍感困難。我過去在東大時的同事陳克孚先生當時任北京蒙藏學校校長，聘我去兼職，補助生活。但北大規定講師不准出外兼課。一九四七年我離開北大。後由朱光潛先生介紹到南開大學任教。因聘書來得太晚，我已另外任職，故將聘書退回。同年，由高亨先生介紹轉任東北中正大學、東北女子文理學院兩校中文系教授，又經遼東學院中文系主任匡扶先生介紹，兼任遼東學院中文系教授。同年十月還兼任了瀋陽益華公司總務部經理。一九四八年初，東北各校紛紛停辦，東北中正大學等校也不能開課了。三月間高亨先生給西北大學中文系主任張西堂拍了一份電報，介紹我赴西大任教。不久，西北大學回電聘我為中文系教授，並寄來聘書。我受聘，於四月間到西北大學任教至今。

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，我陸續在《國文月刊》、《東北雜誌》上發表了很多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。其中主要的有《中國文學史上之文質觀》、《咀華隨筆》、《論文學的復古與革新》、《讀詩偶識》、《說「三瘦」》、《評李杜詩》（以上均發表於《國文月刊》）、《漢賦與俳優》、《詩論蒙拾》、《文論神氣說與靈感》、《論文學的隱與秀》（以上均

發表於《東方雜誌》等。

一九四九年在西安時，被選為西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，並兼任中文系主任、文學院院長。同年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。我開始文學研究以後，原本醉心於學習與研究李太白的詩，以後又專研《杜工部集》。一九五五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《杜甫詩論》。《杜甫詩論》一書從杜甫的生活與思想、人民性、非戰思想、愛國精神、現實性等方面對杜詩進行了較深刻的分析與研究；並且對杜詩「沉鬱」的風格進行了比較深入的闡述。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。一九五九年由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《杜詩散釋》。《散釋》一書，總計翻譯杜詩九十六首。它用散文繹詩，又散落加以繹述，並且對杜詩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也略作了分析。全書共十二章。這本書是為了能夠給學習古典文學的讀者提供一些閱讀杜詩的例說，啟迪初學，古為今用。一九六三年，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《文學賞鑑論叢》。該書收錄了我解放前後發表的關於文學欣賞論文二十餘篇。從解放至「文化革命」前，我曾在《光明日報》、《文藝報》、《文匯報》、《文學評論》、《人文雜誌》、《詩刊》、《西安晚報》、《陝西日報》、《延河》、《西北大學校刊》、《新建設》等報刊雜誌上發表一些文章。其中主要的有：《魯迅在文史研究上的幾點啟示》、《從沉鬱頓挫窺測魯迅的小說》、《詩情畫意》、《詩詞的意境》、《陶詩析疑七例》、《孔雀東南飛》疑義相與析》、《說唐詩的醇美》、《沉鬱的風格，閎美的詩篇》、《探杜詩之琛寶，曠百世而知音》、《試再論杜甫的〈搗衣〉

詩》、《情語與景語談片》等。一九六一年前後曾在《西安晚報》上開闢了《朝花夕拾》專欄；在《陝西日報》上開闢了《燈前漫記》、《旭窗談藝》等專欄。「文革」前曾任《人文雜誌》編委，一九七九年，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杜詩析疑》。《析疑》對杜詩中若干疑難問題，就個人的見解作了剖析，旨在「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」。共計九十三題，是一部爭鳴之作。本書在陝西省第一次優秀書籍評選中，獲優秀文學書籍獎。同年我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。「文化革命」以後，我在《陝西日報》、《西安日報》、《西北大學學報》等報刊上發表了一些文章。其中主要的有《李白詩散釋自序》、《陸璣〈文賦〉今譯》等。現任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理事、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顧問、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副主席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委員會常務委員、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陝西省分會理事、西北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。目前，我正從事《李白詩散釋》的寫作工作。

在古典文學的研究方面，我受清代章實齋《文史通義·辨似》的影響很大。我認為，理解古人的詩文，應該像章實齋說的「盡其曲折」（《文史通義·辨似》）；做這個初步的奠基工作，大略有如下的過程：一要知人論世，二要剖析精粗，三要設身處地，四要緣情度理，五要分清主從，六要區別正反，七要疏通比較，八要衡量揣摩，九要辨明辭義，十要一以貫之。大抵能利用這些規矩繩墨，然後融會貫通，局高臨遠，深入鑽研，大膽嘗試，再識其甘苦，如輪扁斲輪之得心應手，不疾不徐；或游刃有餘，如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，官知止而神欲

行。在研究古典文學方面，我一向反對自清代以來就一直盛行的考據之風，而主張以詞章、義理為主。我認為考據只能做為一個初步的奠基工作，是一個輔助的手段。這一點我在《中國文學欣賞舉隅》一書的「書旨與序目」裡就提出了。另外，在研究文學方面，一定要有創新，不可照搬。唐代大詩人李白在武昌登黃鶴樓，看見崔灝題詩於壁，就不題詩了，只寫了兩句：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灝題詩在上頭。雖只兩句，卻得以流傳後世，因為兩句是他的創造。我搞了近五十年的科研教學，總結出兩個信條：在教學方面，不嚼剩飯再去餵人；在科研方面，不走他人的熟門熟路。在學習方面，應該盡量作到過細。《論語·憲問》云：「子曰：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既然是務在為己之學，當然就要如荀子所要求的：「君子之學也，入乎耳，著乎心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。」（《荀子·勸學篇》）不能像「小人之學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；口耳之間則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？」（同上）我還感到，學習的不二法門，應該是如荀子所說的「日積日一」。積者，是積累知識；一者是「吾道一以貫之」。當然，還要善於學習，杜甫就曾說過，要「別裁偽體親風雅，轉益多師是汝師」。古人在這方面論述極多，且多鞭辟入裡，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。研究和清理古代文化遺產，秉持科學的態度，實事求是地去尚友古人。總之，將這筆珍貴的遺產很好地繼承下來，是古典文學工作者必須經過艱鉅的努力才能夠完成的。

傅庚生著作目錄

-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一九四三年 開明書店出版
中國文學批評通論 一九四五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
杜甫詩論 一九五五年 棠棣出版社出版
國語選 一九五九年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杜詩散釋 一九五九年 西安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
文學賞鑑論叢 一九六三年 西安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
杜詩析疑 一九七九年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——原載於《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》第二輯，頁三四四—三五一。